论清初学术的历史地位

陈　祖　武

有清一代，顺治、康熙二朝是一个创立规模、奠定国基的关键时期。作为一代学术思想的发展，清初的八十年也是一个承先启后、开辟路径的重要阶段。其间才人辈出，著述如林，气魄之博大，思想之开阔，影响之久远，在中国古代学术史上，实足以同先秦时代的百家争鸣后先媲美。

一、清初学术的基本特征

清初学术，承晚明学术开启的路径，带着急剧动荡的时代色彩，呈现出既有别于先前的宋明理学，又不同于尔后的乾嘉汉学的历史特征。这些特征主要可归纳为如下四个方面。

第一，博大恢弘。近代著名学者王国维先生论清学，曾将清初学术归纳为一个“大”字，他说：“国初之学大，乾嘉之学精，而道咸以来之学新。”①顺康二朝的八十年，就一时知识界的为学领域而论，确乎博大。举凡经学、史学、文学、先秦诸子、性理天道、音韵乐律、天文历算、地理沿革，乃至释道二藏，诸多学术领域无不为一时学者所究心。其间，既有博赡通贯如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诸学术大师，亦有或兼通经史诗文，或以专学名家的众多学者，还有成就斐然的若干文学艺术宗匠。他们的繁富著述，博及经史子集，包罗万象，应有尽有，从而为有清一代学者对我国传统学术的全面整理和总结，奠定了雄厚的根基。

清初学术之博大，还在于其气度的恢弘。顾、黄、王诸大师以高屋建瓴之势对一代健实学风的开启；傅山、钱澄之等人对先秦子学的表彰；毛奇龄、胡渭诸儒对宋儒经说的否定；万斯同、谈迁之潜心治史；顾祖禹、梁份、刘献廷之专意地理沿革；梅文鼎、王锡阐等人的钻研天文历算等等，实事求是，无所依傍，若千川万流之齐归东海，奔腾咆哮，冲决宋明理学的网罗，从而开创了一代学术的崭新格局。而费密、颜元、李塨对既往学术积弊的摧陷廓清，则更是空前绝唱。其恢弘的气度，震古铄今，磅礴于世，显示了转移风气的巨大力量。

第二，经世致用。如果说博大恢弘只是清初学术的外在表现，那么为学以经世致用，则是其深刻的历史本质。明末以来的社会动荡，至明清更迭达于极点。农民军的摧枯拉朽，明王朝的土崩瓦解，清王朝的入主中原，顷刻之间，接踵而至。历史的急剧变迁，以及伴随而来的战乱频仍，经济凋蔽，使整个社会陷入空前的危机之中。于是自明万历末叶兴起的经世思潮，至顺康间而空前高涨。一时知识界中人为时代所呼唤，纷然而起，为拯救社会危机而去呐喊，去奋争，迸发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时代最强音。明亡之初，南北诸大儒若孙奇逢、傅山、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等，或挺然走险，组织义勇起而抗清；或暗通声气，出没山林海澨，从事秘密反清活动。当他们投笔从戎的壮举被清兵的铁骑无情否定之后，严酷的现实驱使南北知识界转而走向用著述救世，以期“明学术，正人心”的历史道路。

立足于“神州荡覆，宗社丘墟”的现实，清初的广大学者和思想家进行了沉痛的历史反思。他们或猛烈抨击脱离实际的空疏学风，痛斥“天崩地解，落然无与吾事”的恶劣积习；或对明末以来的社会弊端痛下针砭，直至集矢于高度集中的皇权，敢于道出：“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②“自秦以来，凡为帝王者皆贼也”；③或以“匡扶社稷”为“天下之公”，力主讲求当世时务的经世实学；或以历代兴亡为借鉴，具体地去探讨国家政治制度，文教设施、赋役财政、军制兵法、“夷夏之防”等等。总而言之，学以经世的倡导，此伏彼起，并时而鸣，已成为一时知识界的共识，从而构成清初学术的主干。

第三，批判理学。明清之际，理学已是强弩之末。社会的大动荡和学术发展的内在逻辑，客观地提出了对其进行批判和总结的历史课题。承明人的倡导实学之后，清初知识界为学术的去虚就实，进行了成功的探索。积数十年的努力，举国上下讲求实学蔚成风气。实学的称谓不仅广泛见诸一时学者著述，而且深入庙堂，成为君臣间问对的学术语汇。应当指出，在中国古代学术史上，实学这一概念的使用并不自明清之际始，早在理学形成时期即已出现。然而同样的学术概念，它在不同的历史时代，其内涵则不尽一致。在朱熹集理学之大成的时代，实学主要指的是对封建道德的笃实践履，它所体现的是鲜明的伦理道德色彩。而到了明清之际，一时知识界之倡导实学，不仅既有传统的道德修持，而且更有对社会现实的强烈关注，它的侧重之点已经转向紧迫的经世救时。惟其如此，以“性与天道”为论究对象的理学，便以虚学而成为知识界重新审视的对象。

清初知识界对理学的批判和总结，视角各异，取径不一。顾炎武、王夫之等人，走的是对王阳明心学进行不妥协批判的道路。而黄宗羲则是以学术史的编纂，通过对数百年理学发展史的总结，去彰明学术递嬗的轨迹。孙奇逢、李颙、汤斌等人，却又选取了合会朱陆学术的途径，试图以调停折衷去谋求学术发展的新路。钱谦益、毛奇龄、胡渭等人，则侧重于对宋儒经说的否定和汉唐注疏的表彰，而与理学分道扬镳。独有颜元、李塨、费密等人，对程朱、陆王之学概予排击，别辟蹊径，溯源周孔，以六艺实学的讲求而充分体现清初学术的批判理学精神。

第四，倡导经学。伴随着理学的衰微，自明中叶以后，以经学济理学之穷的学术潮流，已经在传统儒学的母体内孕育。清初，承明人的经学倡导，知识界在摒弃“性与天道”的论究之后，不约而同地趋向于以经学去取代理学的选择。

清初的经学倡导，肇始于江南学者钱谦益。入清以后，钱谦益发展了他先前“以汉人为宗主”的经学主张，进而把经学与史学相结合，高唱“六经之中皆有史”。④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李颙、费密等继起，与钱氏唱为同调。他们或响亮地提出“理学，经学也”的命题，断言“今之所谓理学，禅学也”。⑤或主张融理学于传统儒学之中，重申：“道学即儒学也，非于儒学之外别有所谓道学也。”⑥或表彰儒家经典，强调：“圣人之道，惟经存之，舍经无所谓圣人之道。”⑦经学的倡导与学以经世的时代呼声相结合，形成了通经致用的新学风。

康熙中叶以后，朴实穷经，风气已成。一时经学名家如阎若璩、胡渭、毛奇龄等，奉“一物不知，以为深耻”为座右铭，把清算宋儒“经祸”，还业已“晦蚀”的经籍旧貌视为“经世大业”。⑧在治经实践中，他们沿着顾炎武“读九经自考文始，考文自知音始”⑨的诂经路径，一改宋明义理之学旧辙，穷经考古，原原本本，走上了博稽经史的为学道路。即使是昔日理学营垒中人，亦纷纷以穷经考古而名世。李光地之于《周易》和音韵乐律，李光地、光坡兄弟

之于《三礼》,方苞之于《春秋》、《周礼》，无不体现了这一学术特征。至此，清初学术遂由经学考辨入手，翻开了总结整理传统学术的新篇章。

二、清初学术的发展趋势

清初学术的上述历史特征，说明这一时期的学术发展是一个有规律的历史过程。尽管八十年间的学术界，各种学术现象纷然杂陈，姿态万千，然而学术演进的历史必然性，就蕴号在诸多似不关涉的偶然现象之中，其总的趋势是不以任何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一方面，作为具体历史发展阶段的产物，清初学术带着鲜明的时代特征；另一方面，为中国古代学术演进的内在逻辑所制约，这一时期的学术发展又呈现出承先启后的学术个性。八十年间的学术发展，以晚明学术为先导，在如下几个方面体现出对宋明学术的批判继承。

首先，明末自顾宪成、高攀龙发端的“由王返朱”声浪，入清以后，同“明学术，正人”心的学术反思合流，演为对王阳明心学的猛烈抨击。尽管在顺治及康熙初叶的二三十年间，主持一时学术坛坫风会者，依然是王学大儒孙奇逢、黄宗羲、李颙诸人，然而面对自身学派的深刻危机,尤其是铺天盖地而来的“阳儒阴释”一类的谴责,要固守昔日旧学壁垒，已经成为不可能的事情。于是孙奇逢、李颙不约而同，趋向合会朱陆学术的道路，黄宗羲则以其博大的为学领域和务实学风,在治史以经世的倡导中,摆脱了王学的羁绊。迄于康熙中叶，王学崩解已成定局。随着朱熹学说的日渐深入庙堂，经过清廷的崇奖，突出其伦理道德的约束力量，使之教条化而成为维系封建统治的思想工具。

其次，晚明兴起的经世思潮，在清初知识界对明亡的沉痛反思中空前高涨，形成“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历史共识。一时学术界中人，不分东西南北，亦无论治学好尚，为学以经世的精神，皆深入各自的学术实践之中。经学的倡导，无非是因为“孔子之删述六经，即伊尹、太公救民于水火之心”，而儒家经典乃是“天下后世用以治人之书，将欲谓之空言而不可”。⑩史学的讲求，则是以“国可灭，史不可灭”⑪为出发点，旨在“引古筹今”。⑫究心舆地沿革，同样是为了“世乱则由此而佐折冲，锄强暴；时平则以此而经邦国，理人民”⑬表彰朱熹学说，也是由于“从来尊信朱子者，徒有其名而未得其真”，因而欲以之明“生民祸乱之原,非仅争儒林之门户”。⑭即使是诗文戏曲,归根结蒂同样要“收拾起大地山河一担装”。⑮康熙中叶以后，虽因时移势易，经世思潮业已退入低谷,但作为清初学术的主干,其余波则不绝如缕。当时以经学名家的毛奇龄，尽管已不再问津社会现实问题，然而亦不忘以经学去作“经世大业”。

再次，晚明“通经学古”的经学倡导，同清初知识界批判理学的思潮相融合，汇为以经学济理学之穷的宏大学术潮流。入清以后，以经学济理学之穷的努力不惟充溢南北学术界，而且借助儒臣而深入宫廷。还在康熙二十一年八月，清圣祖便通过与日讲官的论学问对，接受了“道学即在经学中”的观点。此后，“立政之要，必本经学”，成为清廷文化决策的一个重要思想依据，深刻地作用于封建国家的文化生活。直到康熙末叶,清圣祖依然一再重申:“治天下以人心风俗为本，欲正人心、厚风俗，必崇尚经学。”⑯

凡此种种，无一不是对宋明学术的推陈出新。然而经历明清更迭，客观的历史条件毕竟已经发生变化，封建国家的统治者不再是昔日单一的汉族地主阶级，而是以满洲贵族为核心的满汉地主阶级联合政权。满洲贵族为维护自身的统治利益，在文化上所推行的高压政策，

必然要对学术的发展产生影响。因此，清初学术的前述历史特征，又依据此一时期历史发展的阶段性而交互起伏。

大体说来，以康熙二十年前后为界，清初八十年的历史发展过程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前一阶段是旷日持久的国内战争时期，军事征服和巩固满洲贵族的统治地位，乃是压倒一切的任务。野蛮的屠戮和文化的高压，酿成尖锐的民族冲突和文化心理上的对抗。因此，经世思潮的高涨便是这一时期学术发展的首要特征。康熙二十年以后，三藩乱平，台湾回归，随着封建国家经济的复苏，政治的统一，以及清廷文化政策的调整，既为学术文化的发展提供了安定的环境和良好的物质条件，又在思想上确立朱学独尊的格局而严加约束。因此，经世思潮失去其存在的现实意义，最终趋于沉寂。而经学的重振，则凭借务实学风的形成而方兴未艾。

总而言之，客观历史条件的制约，学术演进内在逻辑的作用，两者相辅为用，从而规定了清初学术发展的基本趋势。这就是：以经世思潮为主干，从对明亡的沉痛反思入手，在广阔的学术领域去虚就实，尔后又逐渐向以经学济理学之穷的方向过渡，最终走向经学的复兴和对传统学术的全面总结、整理。

三、关于清初学术的几点认识

如何评价清初学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还是一个可以深入讨论的问题。

1．清初学术的历史属性。

作为观念形态的学术文化，它总是一定时期经济基础的客观反映。十七世纪的中国，古老的封建社会虽然已经危机重重，但是它并没有走到尽头，还具有使封建的自然经济复苏的活力。千疮百孔的封建专制政治体制，经过明清更迭的调整，依然显示出它维系社会的力量。在当时的中国大地上，新的生产方式尚深藏于地平线之下。因此，清初的中国社会并未翻开近代历史的篇章，它仍旧处在封建社会阶段，只是业已江河日下而步入其晚期而已。这样的社会性质，就从根本上规定了清初学术的历史属性。它既不是近代意义上的学术，也不具有反封建的性质，而是中国传统儒学的一个构成部分。惟其如此，所以曾经为某些论者盛称的黄宗羲的反封建思想，如果我们撇弃对《明夷待访录》寻章摘句式的研究方法，将全书作为一个整体去考察，尤其是把它同先前的《留书》和之后的《破邪论》作为黄宗羲政治思想发展的全过程来论究，结论就会大相径庭的。黄宗羲并不是要否定封建的政治体制本身，无非希望以“三代之治”⑰为蓝图对其进行改善而已，其现实的目的则是要为代清而兴的封建统治者说法。同样的道理，在《潜考》中高呼“凡为帝王者皆贼也”的唐甄，他也毫无否定君主专制政治之意，只是要通过明确“尊卑之分”来抑制帝王的独裁。所以他说：“人君唯能下，故天下之善归之，是乃所以为尊也。”⑱而顾炎武的主张“众治”，归根结蒂也是“分天子之权以各治其事，而天子之权乃益尊”。⑲即使是最具批判精神的颜李学派，评说古今，少所许可，依然没有逾越传统儒学藩篱。所以，康熙三十年颜元南游中州，与理学名儒张沐论学。临别，张氏率门人远送，即表示了对颜学的如下基本评价：“向以为出脱先儒藩篱，不知仍在其窠中也。”⑳

同清初封建王朝所奉行的闭关政策相一致，这一时期的学术，从总体上来看也是封闭的。尽管自晚明以来输入的西学为学术界所接受而产生有益影响，甚至深入宫廷激起封建帝王的

浓厚兴趣，然而它丝毫不能改变中国传统学术的格局。清初的学术界，始终没有出现所谓"和世界的进步思想相关联"的历史自觉，更没有产生什么"对资本主义世界的绝对要求。"因此，将清初学术人为地近代化的倾向，是我们所不能赞成的。

事实上，无论是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唐甄的《潜书》，还是顾炎武的《日知录》、王夫之的《黄书》、《噩梦》，乃至颜元激进的《四存编》，其间都存在一个根本的共性，那就是对明亡的沉痛历史反思。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说，清初学术乃是明清更迭促使学术界进行历史反思的产物。因此，当明清更迭的历史过程于康熙中叶结束以后，基于其上的历史反思也就随之而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于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经济、政治、军事、文化诸方面实际问题的探讨，逐渐让位于经史诸学的笃实讲求。以康熙后期朱学独尊格局的确立和对儒家经学的表彰为标志，一代学术终于翻过了清初的一页。

2. 中国古代学术的一个重要发展阶段。

以儒、佛、道三家为主体的中国古代学术，经历了漫长的形成和发展过程。自中华文明起源的夏文化始，经过商、周二代的发展，在春秋战国间，以孔子创立儒家学说而集其大成。西汉初，适应封建大一统的需要，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学经典化而演为经学。尔后，外来佛教学说的中国化和中国自身道教学说的发展，同经学相互渗透，从而推动中国古代学术的前进。经历魏晋玄学的发皇和隋唐佛学的兴盛，迄于北宋间，以儒学为主体，儒、佛、道三家合流而理学崛起。至南宋，朱熹集其大成，后再经明中叶王阳明的发展，中国古代学术遂以理学为代表而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峰。

从朱熹到王阳明，理学极度成熟而失去生机。明中叶以后，在日趋加剧的社会动荡之中，理学陷入深刻危机，中国古代学术面临何去何从的抉择。于是经世思潮应运而起，"通经学古"的学术潮流，把中国古代学术推向对理学的批判和总结。明清更迭的历史进程表明，要在陈旧的封建经济基础之上，建立较之理学更为完善的学术形态，已经是不可能的事情。因此，清初知识界为历史局限障蔽视野，无从看到学术发展的前景，只好回过头去，到传统的经学中寻找依据。这样，在向儒家经典回归的大趋势中，中国古代学术步入进行全面整理和总结的乾嘉汉学时代。尔后，又以之为基础，在向西方寻求救国救民真理的热潮中，跨进近代学术的门槛。

如果说乾嘉汉学是中国古代学术通向近代学术的桥梁，那么清初学术则是由宋明理学向乾嘉汉学转化的一个不可或缺的中间环节。清初学者以经学济理学之穷的倡导，实事求是的为学风尚的示范，诸多学术门径的开启，"读九经自考文始，考文自知音始"的诂经方法论的提出，都为乾嘉汉学的兴起奠定了基础。八十年间，学术界对理学的深刻批判和对既往学术积弊的摧陷廓清，则从总体上为向乾嘉汉学的过渡铺平了道路。所以，乾嘉学术虽然在全局上失去了清初学术经世致用的精神，但汉学诸家考论一代学术源流，则无不溯源于清初诸儒。

3. 应当记取的历史教训。

清初学术，一度生机勃勃。八十年间，璀璨若群星的众多学者和思想家后先而起，他们在广阔的学术领域，以繁富的著述争奇斗妍，谱写绚丽的文化篇章。这在中国古代学术史上，确乎并不多见。前哲时贤比之于先秦时代的百家争鸣，实是最恰当不过。无庸置疑，倘能以之为契机，把握住当时中西文化交流的极好机会，通过经济的繁荣，政治的清明，从而在批判继承中寻求中国传统学术的发展，则中国学术近代化的历程当会来得更早一些。然而

严酷的事实却是另一番模样，历史并没有沿着理想的简单直线向前运动，而是出现了经学复兴的迂迴。固然，这里边有不可抗拒的历史规律产生的深刻作用，但是同时却也存在人为的偶然因素的影响。其间，有若干历史教训值得记取，而清廷文化决策上的短视，便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历史教训。

本来，作为一个新兴的封建王朝，出于巩固其统治地位的需要，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诸方面采取必要的措施，这是情理中事，无可厚非。然而如同满洲贵族一般在文化决策上的短视，及其给历史发展所留下的恶劣影响，纵观中华五千年文明史，则是罕有其比的。他们无视历史形成的民族习俗差异，在入主中原之后，竟然逆历史潮流而动，将本民族的习俗强制推行，责令举国官民剃发易服。这种野蛮的文化高压在民族心理上造成的隔阂，不仅加剧了清初的军事对抗，而且鸿沟历二百数十年而不能填平，从而在一代历史中时隐时显，成为长期潜在的一个严重不稳定因素。顺治间，接二连三地出现的焚书，禁止知识界“别创书院”、“纠众盟会”，㉑以及科场案、奏销案、哭庙案等等，无一不是这种文化决策短视倾向的延续。康熙初的庄氏史案，则大开一代文字冤狱的先例，从而最终确立了文化高压的格局。

康熙二十年以后，新兴王朝的统治业已巩固，按理对于文化上的高压可以缓解，然而清廷却又在文化凝聚力的选择上，重蹈短视旧辙。在理学史上，朱熹与王阳明学术的是非，这本来是学术界讨论的事情，完全可以通过学术争鸣去解决。可是清廷却以惩治王学儒臣，独尊朱熹学说的形式，一再进行粗暴干预。其结果，王阳明学说中的理性思维光辉被抹煞，博大的朱熹学术体系则沦为封建伦理道德教条。在文化高压之下早已谨小慎微的清初思想界，既被人为地加上了封建道德教条的桎梏，旋即又遭戴名世《南山集》案的打击，畏首畏尾，噤若寒蝉。从此，清廷留给知识界的，就是唯一的经学考据的狭路。至于作为中西文化交流媒介的传教士，则被清廷严密控制在京城有限的范围之内。他们所带来的天文、历法、数学知识，尽管已经深入皇室，但是由于得不到清廷的提倡，始终未能成为显学。简言之，上述历史教训是值得我们认真记取的。

---

①王国维：《观堂集林》卷二十三，《沈乙庵先生七十寿序》。
②⑰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原君》。黄宗羲：《破邪论》卷首，《题辞》。
③⑱唐甄：《潜书》下篇下，《室语》、《抑尊》。
④钱谦益：《有学集》卷三十八，《再答杜苍略书》。
⑤顾炎武：《亭林文集》卷三，《与施愚山书》。
⑥李颙：《二曲集》卷十四，《周至答问》。
⑦费密：《弘道书》卷上，《道脉谱论》。
⑧毛奇龄：《大学知本图说》。
⑨⑩顾炎武：《亭林文集》卷四，《答李子德书》、《与人书三》。
⑪黄宗羲：《南雷文定》卷六，《次公董公墓志铭》。
⑫⑲顾炎武：《亭林文集》卷四，《与人书八》。《日知录》卷九，《守令》。
⑬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首，《凡例》。
⑭吕留良：《吕晚村先生文集》卷一，《复高汇旃书》。
⑮⑳李玉：《千忠戮》。李塨：《颜习斋先生年谱》卷下，五十七岁条。
⑯《清圣祖实录》卷二百五十八，康熙五十三年四月乙亥条。
㉑《清世祖实录》卷一百三十，顺治十六年十一月甲戌条。